

社会转型、时空压缩与生态文明建设^{*}

包双叶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系, 上海 200237)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呈现“时空压缩”特征,表现在社会转型历史方位目标和社会系统各个领域发展的“时空压缩”。转型社会“时空压缩”特征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时空压缩”给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后发优势,即拥有“择优综合”的外部条件和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时空压缩”也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更加紧迫的现实任务和国际社会压力。在“时空压缩”背景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健康推进需要社会转型目标和社会结构的优化,以及对地方性生态思维的超越。

关键词:社会转型;时空压缩;生态文明建设

一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呈现“时空压缩”的结构特征

关于时空问题的讨论在自然科学界由来已久。在牛顿力学中,时间和空间是独立于客观事物的绝对存在。而在相对论中,时间和空间不具有绝对性,它们会随着客观物体的运动变化而变化。在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中,时间和空间成为“形塑”现实存在的最重要因素。在社会科学领域,戴维·哈维(David Harvey, 1990)在《后现代条件》中,从时间与空间概念的角度研究全球化,最早提出“时空压缩”概念。哈维指出,全球化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和体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日常生活中在相同的空间和时间中把不同的(商品的)世界聚合到一起的各种拟像交织,几乎完全隐藏了一切原初性的痕迹,隐藏了生产它们的劳动过程的痕迹,或者掩盖了隐含在它们的生产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痕迹。这些拟像本身反过来变成了现实”(David Harvey, 1990: 300)。在社会学中,学者们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对“时空压缩”概念作了延伸性使用(徐祥民, 2010: 63)。

全球化浪潮的快速推进,把中国与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卷入到社会转型洪流之中,也启动了中国奋起直追西方发达国家的征程。而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又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并通过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深刻影响,这不得不促使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其发展战略,调整社会转型方向,使得他们处于还没有完成现代社会的转型还要面对后现代社会挑战的尴尬境地。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后发性与超越性、追赶型与自主发展型相统一的复杂特征。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被压缩到同一时空之中。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方位与目标呈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关于当前中国进行的社会转型是何种意义上的转型,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新型现代性”一说,也有“新现代化”、“双重社会转型”等称谓。任平认为“今日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韦伯时代的经典现代化(虽然我国在许多方面还未完成经典现代化的任务),也不是后现代(中国还缺乏建设完整的后工业社会事物基础和条件),甚至也不是在完成‘反思的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因为中国目前不可能完全撇开工业化进程而直接完成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11JCLM04YB)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2013EKS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知识化) 而是一种以知识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现代化”(夏东民, 2008: 38)。王雅林(2003)提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目标和特点是既要实现工业化,也要实现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等的新型现代化。是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型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的转型同步进行的“双重社会转型”。这是因为从全球角度来看,当今的发达国家已处于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以信息化、知识革命为标志的新一轮社会转型,人们把其称作“信息社会”的转型。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开放时代,发达国家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自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早发国家的社会转型将会对后发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产生巨大的冲击和调整。正如王雅林所指出的那样,“席卷全球的信息化、知识化浪潮作为不同于工业化的新型生产力结构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发展的动力系统,它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结构和要素发生了从物质型向信息型即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的根本转变。它不仅推动着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形态的过渡,而且也使作为后现代化国家的我国的现代化社会变迁具有了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社会变迁的新的性质和特点”(王雅林 a 2003: 89)。分析发达国家社会转型的时空特征,能够清晰看到一个工业化、信息化前后相继的历史脉络。西方国家最早启动工业革命,走过了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当前他们继工业文明已迈向了后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因此,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转型呈现出工业化、信息化依次更替和延续的时空特征,也就是“二元社会结构的演进”,即“二元结构的演进是先发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它们先是工业与农业的二元对话,待工业化完成后,又逐步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进入到后工业化与工业化的二元对话结构之中”(巩章义 2003: 111)。中国作为后发转型国家,要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呈现出“时间压缩性”。与此同时,中国还要面对发达国家第二次转型带来的信息化、生态、风险社会等的冲击,体现出“空间压缩性”。因此,“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着—个共时存在的多元参照系,有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各种经济形态、政治理念、文化模式、生活方式等……”(金民卿,1998: 20)。

其次,当前中国社会系统各个领域的发展也都呈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其一,就工业化进程来看,虽然中国的总体工业化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但是地区之间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工业化进程一般被划分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发展阶段。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具有工业化的三个阶段依次更替的特点,而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地区之间发展失衡,工业化的三个阶段同时并存的特征。工业化进程的“时空压缩”特征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面对这些复杂的现实状况。例如,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或发展高新产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而降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能源消耗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与此同时,发展密集型产业以吸收和消化庞大的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其二,就人的发展进程来看,马克思曾经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把人与社会的发展分为三大形态或三个阶段,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 2009: 52)。同工业化的进程共存前工业的、工业的、后工业化的特征相类似。从人的发展状态来看,“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的三种形态也共存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制度、法治建设的完善,对“人的依赖性”社会的批判和矫正进一步深化,在消解“人的依赖性”方面取得积极改变,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的依赖——人情网络关系’、‘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官本位’等等现象并没完全终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仍然被束缚在某种宗法等级特权的体制之中”(王雅林 b 2003: 105)。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得社会生活中“物化”倾向越来越突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的发展不仅体现出进步性,也存在一定弊端,“具有双刃剑性质的,既使人获得了独立性,又使人从‘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形态‘转型’到‘非神圣现象’中的‘自我异化’形态,致使社会出现‘人的困境’”(王雅林 b, 2003: 105)。

关于第二阶段“物的依赖性”的弊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身的对立,即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已经在西方早发国家社会进程中暴露无遗的情况下,超越或扬弃第二阶段,而追求第三阶段的“自由个性”成为中国的必然追求,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倡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其三,就文化转型进程来看,中国社会转型也体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和精神现象齐聚一堂,共同形塑着当前中国文化转型。一是传统的封建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远未完成。传统文化对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既漫长又复杂的历史过程。二是还存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转型。三是存在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交替。“正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西方人已不再关心工业化的逻辑与规范,却热衷于把工业化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和危机揭示给我们看,这一变迁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刚刚把世界纳入自己视野的稚嫩东方文化心灵,还来不及辨识工业文明的实在精神,就不得不准备挺身接受来自后现代思潮的冲击”(陈一放,1998:45)。当前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格局和特征是新旧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汇重叠在一起,很难划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转型的清晰界限。

二 “时空压缩”的结构特征对生态文明的双重影响

转型社会的“时空压缩”特征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双重影响,既包含积极的一面,也包含消极的一面。“时空压缩”特征给中国转型社会带来的不仅是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时空压缩”特征的双重效应同样影响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趋势和未来走向。一方面,“时空压缩”特征的正面效应使中国能够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技术、手段,也能引以为鉴,避免走先发国家走过的弯路。另一方面,“时空压缩”特征也使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面临更加紧迫的现实任务和国际社会压力,从而遭遇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劣势。

中国过去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环保投资占 GDP 比例比较

时 间	起止年份	环保投资(亿元)	环保投资占 GDP 比例(%)
“六五”期间	1981—1985	166	0.50
“七五”期间	1986—1990	476	0.69
“八五”期间	1991—1995	1 306	0.73
“九五”期间	1996—2000	3 600	0.93
“十五”期间	2001—2005	8 393	1.30
“十一五”期间	2006—2010	15 400	1.50

“时空压缩”特征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时空压缩”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在付出巨大努力和沉痛代价的同时,也给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毋庸置疑,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都离不开雄厚的经济投入,早发国家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与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济投入密切相关。纵向比较可知,中国环保投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正在逐年加强,通过过去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环保投资的绝对值及其增长速度的分析可见一斑(姜春云,2007:187)。第二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拥有“择优综合”的外部条件。作为后发国家,借此新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和重叠的特征,借鉴和吸收先发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科技成果优势和先进理念,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拥有比较优势的外部条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1962年发表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后起之益”学说。所谓“后起之益”(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是指后起国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起国地位所致的独特优势,而这种独特优势是发达国家不可拥有的,与后发国家经济社会的落

后状况共生共存的一种状态。这种“后起之益”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后起国家对先进国家工业化所谓标准前提条件和理想工业化模式中相应内容的替代。其意义在于,这种经过比较和选择的方式或途径产生的效果,往往导致这些国家工业化在资源条件上的可选择性和时间上的节约,最终促成后起国家工业化的成功”(张志勇 2006: 61)。第二层次是指后起国家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学习和吸收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致力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强烈愿望下,加快后起国家的转型发展进程,从而缩短孕育工业化等的自然历史过程”(张志勇 2006: 61)。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的“后起之益”不仅存在于经济、工业化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能产生“后起之益”。先发国家工业文明的起始时间比起后发国家要早很多,生态门槛的到来也比发展中国家早。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也较早。“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成为生态文明的先驱者,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迅速发展,同时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提高效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诸大建 2008: 30—31)。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借鉴国外生态文明实践方面的优势,同时能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和错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达国家的某些生态现代化方面的理念和政策,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第三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正在逐步形成之中,中国完全可以从受益。自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越来越完善,并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谓全球环境治理,主要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经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个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就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蔺雪春 2006: 39)。当前,全球环境治理主体不仅包括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也包括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他们在控制全球变暖、臭氧层保护、控制人口数量、淡水资源保护、污水处理、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等多个领域开展全球范围或区域范围的交流与合作,制定相关的条约、协议等,试图解决一国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共同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全球环境治理可以简单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多个分级国际组织,针对某一类生态环境问题,为各国政府提供交流、对话和商谈的平台,签订相应的条约和协议,如,“生物多样性条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等。这不仅有利于全球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缔约国之间的相应责任和义务的确定以及相互间交流和学习环境治理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另一种类型是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项目合作。参与环境治理的合作项目不仅能够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来治理国内大气污染、北方风沙等生态问题,也能够在项目合作中得到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学习科学的组织协调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等。

“时空压缩”特征也给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后发劣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跨越式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资源短缺等压力。中国是一个极其迅速转型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百年时间完成的社会转型,中国却要在很短的几十年内经历。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同时进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并开始深度影响世界经济,这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要迅速得多,集中得多,复杂得多。“时空压缩”导致中国在一些事务的处理上时间紧迫和空间拥挤,甚至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无奈选择。中国赶超式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起了催化作用,使得“时空压缩”特征呈现得异常强烈。中国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上,有时会顾此失彼。很多时候,中国政府的环保政策或者建设生态文明的愿望在发展经济的压力下遭受挤压,以至于国家虽制定了周全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政策,但难以顺利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压力来自多个方面,这些压力无孔不入地干扰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政府和社会往往很难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第二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承受着来自先发国家的挤压。先发国家较早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资源瓶颈,他们在极力发展生态化技术产业的同时,把落后的工艺、产业等迁移到落后地区,或者把本国制造出来的垃圾倾倒在别国的国土上以减轻自身国家的环境资

源压力。西方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换取自身国家的生态平衡。一是利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开采和购买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矿物资源以节省本国领土范围内的矿产资源。以美国为例,美国虽然是世界上矿产资源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每年从其他国家进口各种矿物资源,以节省或补给自身短缺的资源。美国国内所需各种矿物资源中完全依靠国外进口的就有十来种,有50%以上依靠其他国家的矿物资源有二十到三十种。仅石油资源来讲,近一半的数额依赖进口(黄素庵,1996:373)。二是西方国家还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加工产品,以保护自身国家的森林植物资源和土壤。“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胡连生,2010:110)。另外,发达国家把自己国家产生的生活垃圾和有害废气物倾斜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人居环境的破坏换来自己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是把一些工业废弃物、生活垃圾等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曲如晓,2003:71)。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迫切心理和资金短缺的窘境,以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把一些在本国禁止生产的重污染工业和产业设备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生产,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而他们却既赚取了巨额利润,又转移了本应承担的环境治理责任(胡连生,2010:112)。

三 “时空压缩”背景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出路

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特征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影响来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健康推进需要优化社会转型目标、优化社会结构以及超越地方性生态思维:

首先,通过优化社会转型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且曲折的社会变迁过程。社会转型的目标和道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利益矛盾冲突都会造成社会转型模式的调整和优化。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目标必然是跨越了西方社会转型模式的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新型现代化”(或者“新型现代性”)。“新型现代性”的道路,“是那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双赢、人与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郑杭生,2009:7)。新型现代性所要达到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工业文明以知识文明为重要引擎、人类发展以生态文明为重要原则、城市进程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重要引擎、人类发展以区域协调为重要保障、物质文明与政治、精神、社会文明同步发展、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交相呼应。“新型现代性”引领的已不再是传统工业化,而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建设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需要从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三个层面来积极推动。在小循环层面,要通过设计和优化生产个体内部各道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最终实现生产个体在生产领域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在中循环层面,要通过企业之间或产业之间的废弃物利用与生态产业园区建设,使得一个企业或产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企业或产业的能源和原料,从而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最终实现在中循环层面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在大循环层面,要通过发展把废弃物资源化的静脉产业,例如废旧物质回收利用,中水回用以及废热回用等,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产业间的物质交换,最终实现在大循环层面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新型现代性”引领的已不再是传统城市化,而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传统城市化是一种蔓延式发展的城市化,而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所倡导的是紧凑型发展的城市化,其特征表现为紧凑的建筑、紧凑的街区、紧凑的城市、紧凑的区域等。如果我国未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以大都市为区域中心,发展形成若干个相对紧凑的大都市带,吸纳7—10亿的人口,那么,我国就获得了推动内含生态文明的新型城市化的土地资源 and 空间资源条件。“新型现代性”引领的是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主张人们的福利水平由传统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转变,相应地实现消费方式由物质主义向功能主义转变,即购买和使用产品的主要目的是达到某种功能而不是占有物质本身。传统现代化引导的物质主义消费方式使得消费者更多地去关注物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而生态现代化引导的功能主义消费

方式却截然不同,他使得消费者更多地去关注物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

其次,通过优化社会结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空压缩”特征导致社会分化加速、经济发展快于其他领域、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合理和失衡的状态。而社会关系的合理性和社会运行的稳定性会给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从而有利于生态文明的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构成的统一体。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先导,社会建设是归宿,生态文明建设是前提。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统一和和谐发展,才能保持合理的整体社会结构,促进转型社会的顺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它既具有自身建设的独立内容,同时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又具有高度相关性。因此,优化社会结构,优化协调社会基本领域之间的关系,克服严重的结构失衡和“脱节”,加快发展滞后领域,例如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等,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融合渗透,赋予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以生态尺度,才能真正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操作性和实际成效。科学发展观一方面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转型规律和结构调整必要性的深刻认识,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

此外,通过超越地方性生态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全球化带来“时空压缩”和重叠的特征,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双重效应。从全球范围来讲,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和吸收先发国家的生态科技成果优势和先进理念,也能够有效利用全球环境治理体制在生态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承受着来自先发国家的挤压和“生态殖民”。从国内范围来看,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特征对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境。在由信息化、网络化迅速推进的开放时代,不同生产、生活、观念拟像交织,普遍提升了人们的环境意识,激发了保护家园的行动。在此情况下发达地区延续早发国家污染转移的方法来改善生态环境的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全球化的快速蔓延把我们带入了跨国消费资本主义的世界,同时也是全球人民环境意识觉醒的世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超越狭隘的疆域思想和地方性生态思维,加强各国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区域之间的联动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建构新的文化交流方式,共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的持续稳步发展。

(责任编辑 唐忠毛)

参考文献

- 陈一放,1998,《论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 巩章义,2003,《试析经济时空压缩下的发展战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 胡连生,2010,《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3期。
- 黄素庵,1996,《重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 姜春云,2007,《偿还生态欠债》,北京:新华出版社。
- 金民卿,1998,《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化》,《哲学动态》第6期。
- 蔺雪春,2006,《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中国的参与》,《国际论坛》第3期。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曲如晓,2003,《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影响》,《经济与管理研究》第6期。
- 王雅林 a,2003,《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维度》,《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
- 王雅林 b,2003,《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
- 夏东民,2008,《现代化原点结构:冲突与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徐祥民、宋宁而,2010,《时空压缩:日本环境劝说形成的条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
- 张志勇,2006,《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化、信息化与跨越式发展》,《东岳论丛》第7期。
- 郑杭生,2009,《60年:中国社会如何转型与发展》,《学习月刊》第10期。
- 诸大建,2008,《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David Harvey,1990,《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